

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论集

历史 与现实

三秦出版社

91722

1800
21



200413338

历史与现实

主 编 张大可 马明达

副主编 王三北 张德芳

三 秦 出 版 社

历史与现实

张大可 马明达主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湘子庙街12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201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300

ISBN 7-80546-120-1/K·44

定价：2.90元

前 言

本书是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员论文集，大多出自青年会员之手。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的宗旨，是为适应改革与开放的新潮流，组织中青年加强学术联系，探讨历史学如何为现实服务。故本论文集题名《历史与现实》。甘肃中青年历史学会成立于1986年7月10日，这是学会的第一本论文集。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收论文，除第一组外，均为对具体历史问题的探讨，而成立学会时开展的“历史与现实”讨论的纯理论文章一篇也没有收录。由于论文是各位作者就自己所研究的内容形成的研究成果的汇集，因此内容较杂，似乎与书题不太合谐。但是本论文集所收的这些文章都有一个比较新的立足点，即充满了强烈的现实感，说明了学会成立时开展的“历史与现实”的讨论初结硕果。因此用“历史与现实”这个题目作论集的书名，不仅仅是用以志记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的成立，而且与这些论文所散出的时代气息相适应。

本书汇集的论文包括代序和跋共二十九篇。论文分为八组。第一组文三篇，讨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及其价值。第二组文五篇，从不同侧面提出对中国历史的反思。第三组文三篇，第四组文四篇，分别评述历史上的所谓明君贤臣的事迹，是一些传统节目的新论。第五组文四篇是散论。第六组文三篇，讨论近代史中的一些专题。第七组文二篇，总结历史上对西北，特别是对甘肃的开发，属于区域史研究的范围，体现地方色彩。第八组文四篇，则是从事世界史教学的中青年教师提供的。其中“中华大帝国志评介”一文是一篇书评，介绍古代西方人是如何看待古代中国的。

2079/13

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有会员一百一十二人，近年来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有数百篇，出版的专著有十余种，象叶晓军的《中国都城图录》、刘建丽的《吐蕃历史资料》都是上百万字的大型图书，它出自中青年之手，是不寻常的。我作为这个学会的会长，面对会员们的这些成果，喜悦之情，油然而生。仅借这个机会，对在学术研究上做出贡献的会员们表示祝贺，对正在努力拼搏的会员们寄予殷切的希望。同时对支持本书出版的兰州大学、西北师范学院、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科研处及马明达、李清凌、张德芳、张玉良同志表示衷心地感谢。

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会长 张大可

1988年7月

目 录

历史与现实(代序)·····	张大可(1)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辨析·····	朱智文(9)
略论当代史学跨学科整体化研究趋势·····	贾东海(19)
谈谈封建社会的传统惰性力·····	徐日辉(25)
王安石变法失败反思·····	李伏虎 彭清深(31)
古代考试制度对传统思维定势的影响·····	魏明孔(40)
中国古代功利主义科技带来的思考·····	陈 静(50)
清末中西法律的冲突与融合·····	陶广峰(59)
论刘邦用人与人才竞争·····	李宝通(69)
论北魏孝文帝在用人制度上的改革·····	张金龙(79)
论康熙的致治之道·····	左书谔(88)
政论家贾谊·····	张大可(94)
略论西汉中兴人物·····	张德芳(101)
山西出将——简论李广·····	黎尚诚(106)
论鸦片战争中的牛鉴·····	王 劲 相生全(113)
略论中国古代官员的监察制度·····	刘新建(124)
隋朝社会的阶级结构·····	李清凌(133)
“败人”“败国”的两宋党争·····	刘建丽(144)
试论突厥人的尚东拜日习俗·····	吴景山(152)

中国近代历史特点及现代化道路·····	张海声(161)
谈谈辛亥革命时期的非资本主义化思潮·····	李建国(168)
抗战初期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	屠文淑(177)
略谈西汉王朝对甘肃地区的开发·····	郝树声(187)
隋朝西北开发政策的启示·····	王三北(202)
哥伦布航行的意义及其评价·····	徐均平(212)
略论沙皇彼得一世的宗教改革·····	王起亮(216)
略述古巴人民革命的胜利·····	黄玉清(227)
《中华大帝国志》评介·····	王 钺(238)
跋·····	陈家声(246)
附录：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组织名单·····	(248)

历史与现实（代序）

· 张大可 ·

—

回顾历史就可以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学术发展，大都在一个新兴王朝的第二代、第三代人身上。我们的祖国自建立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以来，已经历了整整一代人。共和国的第一代经历了许多曲折和坎坷，却为我们第二代铺垫了道路，这是我们不能忘怀的。就象历史上的周期重演一样，我们第二代正好赶上了共和国进行改革与开放的新世纪，展望前景是大有作为的。就目前史学界的情况来看，科研队伍迅速壮大，一代新人在崛起，研究成果不断涌现，每年新出版的史学论著和上千种报刊发表的史学论文难以计数。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年来来的史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是就在这繁荣的背后，许多人感到了“史学危机”，不仅仅是出书难，而是对史学的价值提出了疑问。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历史的出路在哪里？一个人一辈子陷在故纸堆中究竟有什么价值？带着这些问题和迷惑，甘肃省中青年史学工作者在一九八六年七月进行了一次学术讨论。在讨论会上成立了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这本论文集就是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组织会员所写的，三分之二出自青年作者之手。尽管一些文章的论证，还显得有些稚嫩，但表述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感，不乏新鲜气息，值得一读。

二

当今中国，正面临着一场变革。社会经济在变革中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经济基础的变革，必然要引起上层建筑领域的动荡与变革，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史学是上层建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史学危机”，正是这种变化的客观反映。近几年来史学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个自我封闭的小圈子，其表现是：研究领域狭窄，课题陈旧，研究方法保守单调，研究成果与社会需要脱节，表述语言不通俗，因而史学成果不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要打破这种封闭局面，史学必须创新，创新则必须面向社会，面向现实。

三

“历史研究必须为现实服务”，这本来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秀传统。孔子修《春秋》，目的在于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准则，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使乱臣贼子惧。司马迁作《史记》，为的是“志古自镜”。司马光修编年史，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刘知几在《史通》中说，《史记》、《汉书》被目为五经之亚。历代封建王朝十分重视修史。宫廷有女官写帝王起居注，朝廷有史馆修实录、修前代历史，地方修方志。这是因为历史有资于借鉴，这是它不可磨灭的价值。

但是，“历史为现实服务”在共和国第一代人的实践中，由于受极左思潮的干扰，变得十分庸俗，史学成了政治的婢女，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篡政历史，大搞“影射史学”，不仅在思想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而且在实践中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四人帮”倒台以后，学术界批判“影射史学”，一

度出现“为历史而历史”的倾向，有人主张回到乾嘉史学中去。随着社会改革的深入，这种思想倾向还没有形成气候就被“史学危机”的呼声冲消了。因为脱离现实的史学研究是没有出路的。所谓“史学危机”，并不是说史学没有用，它只是对脱离现实的所谓纯粹史学的挑战。一方面我们反对用历史图解现实，同时我们又反对历史脱离现实，即历史既要为现实服务，而又不能等同现实，这两者的关系如何界定呢？

历史与现实，这两者是对立的统一，二者互为因果，互相渗透，互相影响。过去的历史包含着产生现实的条件，而现实不仅烙有过去历史的痕迹，而且今天的现实，就是明天的历史。李大钊就说过：“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李大钊选集》第94页）换句话说，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将转化为历史。但并不是说，历史就是现实，现实就是历史。“四人帮”“影射史学”的罪责正在于此。他们讲“儒法斗争”，讲“两条路线”，就混淆历史与现实的界限，说什么全部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儒法斗争的历史，儒法贯通古今，秦始皇是大法家，秦始皇的暴虐不能批判，相反的“愈是清官愈要批判”，真是荒谬之极。现实的颠倒，导致了历史的颠倒。否定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如同割断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一样，同样要受到历史的惩罚。历史的发展，不仅有形式上时间的区分，而且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的具体内容。这些不同的具体内容构成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历史的阶段性反映了历史与现实的区别。因此，我们讲历史与现实，既不能割断二者的联系，也不能混同二者，把“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变成“历史研究为现实的政治图解”。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主要是一个实践问题。面对着今天宏伟的改革与开放的新时代，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如何实践呢？

四

历史如何为现实服务，甘肃省中青年史学会成立之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借这个机会把讨论的要点概括如下：

第一，历史研究应当对现实开放。提出这一问题，目的是要摆正历史与现实、史学与现实的关系，让史学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过去的历史，虽然已随时间逝去，但它的痕迹还保留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保留在社会关系、政治生活、思想意识中，保留在艺术作品和风俗习惯中，还在以种种方式或明或暗或强或弱地影响现实，在现实中顽强地表现自己的力量。就以当前的改革来说，它激发起千百万炎黄子孙的爱国主义情怀。“振兴中华”的口号响彻云霄。然而改革的步履甚是艰难，踟蹰不前，这就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的历史原因。封建社会沉重的历史包袱仍然拖住了东方巨人前进的脚步！中国值得自傲的是她有着悠久的文明历史。在古代中世纪以前，中国在世界上一一直处于领先地位。汉唐文化，光辉灿烂。早在战国时期，商品经济就十分发达。但中国没能以自身的动力进入资本主义，在明清以降，逐步落伍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这是什么原因，应当反思，应当重新考察我们民族的历史，考察前贤对这个历史的认识，甩掉羁绊，代之以新的、充满理性和科学光芒的思想。对历史的反思是提出新思想的前提。而提出新思想则又是抛弃传统文化糟粕的前提。不要一提“丑陋的中国人”就跳将起来。一个人认识了自己的丑陋，恰恰是走上进步的新起点。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连自己的美与丑都认识不清，谈何创新！

第二，历史研究应向人类全部历史活动开放。提出这一问题，就是要开拓历史研究的新领域，研究新问题。中国传统文化

凝结成为文献成果，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类，史部居于第二位，是十分丰富的。但传统史学载述和研究的领域基本上局限在王朝政治史的范围内。史学三大体，纪传体史丛书，编年体史丛书，纪事本末体史丛书，无不着眼于治乱兴衰四个字上。随着近代革命的兴起，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史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我们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体系，不仅理论的研究薄弱，而且在实践中建树的成果少得可怜。共和国第一代人的实践在不停顿的批判中走完了一生，所谓五朵金花的研究，建树的成果在哪里呢？举例对农民战争的研究来说吧。传统史学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就是阶级斗争，而在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就是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爆发了大大小小数百次农民战争，它不但没有把中国封建社会推进到资本主义，倒是锻炼了中国封建社会更加专制和稳固，使它百炼成钢。农民战争规模一次比一次威武雄壮，中国封建王朝专制政体则愈来愈固若金汤，形成了恶性循环。传统史学观点又认为：农民战争瓦解旧王朝，扫荡了大批地主分子，使封建社会的锁链松弛，从而推进了社会向前发展。因此，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过后就要出现一个新兴的封建王朝，带来短暂的太平盛世。但无情的历史事实确是：军阀混战、腐朽王朝的内部倾轧，也照样瓦解旧王朝，打杀大批地主分子，而且对于生产力的破坏，无论农民战争、还是军阀混战都起同样的破坏作用。由此可见，传统史学观点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分析从理论到实际都违反了形式逻辑，超出了常人的智力理解范围，而恰恰是又把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于是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分析出现了地主阶级让步政策说与反攻倒算说两种学术观点。到底如何从宏观的角度贯通地看待中国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值得用新的方法重新研究。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首先必须是研究方法的开放。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不仅仅是编纂体例的创新，更

主要的是历史方法的创新。司马迁的方法是以人为中心来研究和贯穿历史。《史记》中的人物传记，用今天的话来概括，可以说它是全方位干预社会生活的报告文学，所以内容丰富多采，读来扣人心弦。我们现代人修的章节体通史和断代史庄严肃穆，瘦骨嶙嶙，入目的是一副板块理论的框架，没有社会生活的血肉，很难说是成功的。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这个“器”就是研究方法。新中国建立后，史学工作者用历史唯物论研究史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突破，这是主要方面。但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方法论研究仍重视不够，从而把唯物辩证法、阶级分析方法、五种生产方式等方法论当作了教条，成了模式，甚至排斥一般的最新史学方法，使史学走上了僵化。一个人从事史学研究应当有多种手段，多种方法。史学方法是历史学的工具，它随历史学的发展而不断更新和发展。近年来史学界对方法论的讨论十分活跃，这是史学即将有飞跃发展的一个前兆。所谓“史学危机”，它只是传统史学的危机。所谓传统史学，有两个方面的传统。乾嘉考据是微观史学的传统，它是中国固有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视全部人类历史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是宏观的抽象的唯物论史学的传统。单纯的微观研究或单纯的宏观研究都不会再有什么创新。将两个传统综合，把微观的研究与宏观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吸收一切先进的方法，引进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才能创新。历史研究的方法应是多层次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学的高超层次，历史研究应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但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教条和板块，对具体历史的研究需要基础层次的具体方法，尤其需要新的方法。例如，对封建国家机器的研究，如果只停留在阶级分析上，仅仅揭露其阶级压迫的本质是很不够的。如果引进自然科学的系统论和控制论，从整体上去研究国家机构的系统、结构、功能、机制、程序、效率及其演变，就可以

使我们对封建国家机器的认识更加具体、准确、深刻，并给人有一个全方位的立体感。再如，传统史学对历史事件大多停留在一般的描述和定性的水平上，缺乏定量的分析。如果引进计量的方法，借助现代计算机和数理统计理论，史学家就可以把大量历史档案中的“死”数字变成有价值的“活”材料，并从量的规定性上去说明历史事件，其结论就更加可靠和令人信服。

至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也不应限于狭义历史学自身的范围，而应当与多学科的交叉渗透来实现。当前许多新兴边缘学科的兴起，填补了传统学科之间的许多空白。例如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心理历史学等等，许多在我们传统史学中都是空白，而在西方早有长足的发展，我们应当迎头赶上。总之，历史研究如向人类全部历史活动开放，建立新史学的体系，正是方兴未艾之时，史学危机是不存在的。

第三，历史研究的成果应向整个社会开放。历史学要取得蓬勃发展，它的成果必须在社会中广泛传播。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的表述形式。首先，史学体裁要丰富多样，其次，表述语言要生动流畅，其三，对具体的历史对象的研究应进行多层次表述。高层次的史学论著主要在史学界内部传播，这个圈子虽然小，但它起指导的作用。中级的和普及的读物则在广大群众中传播，史学要新生，必须要占领这个读者层，史学也只有进入了广大群众中才能发挥最高的效益。因此普及史学的工作在我们这一代人肩上，应当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以上三点，凝炼成一句话就是：开放，就是史学的出路。甘肃省中青年历史学会成立时的学术讨论，这是一个中心议题，表现了新一代的青年对历史学如何发展进行了深刻的探索。西北师院王三北同志，就用“开放，史学的出路”为题发表了专论，引人注目。

历史如何为现实服务，正如本文前面所说，它主要不是一个

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如何实践，本文提出问题，也只是引起一个话头，让我们共同在实践中来回答吧。

仅以上文为代序。

关于历史与现实的辨析

· 朱智文 ·

笛卡尔针对历史研究脱离现实的情况曾作了形象的描述：“历史学家是一个远离故乡而生活的旅客，对他自己的时代反倒成了外人。”（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68页）他称这种现象为历史的“逃避主义”。目前中国与苏联史学界喊出的“史学危机”的呼声，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对史学研究与现实脱节现象的不满。究竟历史研究能不能为现实服务？怎样才能为现实服务？归结起来都是要我们回答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本文试谈个人浅见。

一、历史与现实的联系

苏联史学家从历史认识的过程方面将“历史事实”这个概念作了三层次的划分：（一）客观存在的历史过程；（二）反映这一过程的史料；（三）根据史料再现既往的客观历史过程的科学的映象（参见陈启能《论历史事实》，《史学理论》1987年第4期）。受此启发，笔者认为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可归纳为两方面：一是客观历史过程与现实的关系；二是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

客观历史过程与现实有着紧密的联系，并由此决定了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人们把对客观历史过程的认识系统化、科学化归结为历史科学。历史科学与现实的关系有着必然的联系。英国

史学家爱德华·卡尔认为：“在研究一个历史学家之前，应该先研究他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历史学家是单独的个人，同时又是历史和社会的产物。”（卡尔《历史是什么》44页）“历史学家在开始写历史之前，都是历史的产物。”（卡尔《历史是什么》39页）纵然一个史家有超脱观念的愿望，有选取远离现实问题的自由，但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观念和思维方式象影子一样伴随着他、影响着他。克罗齐著名的观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包含着这样三层含义：（一）研究历史总是现时现刻的思想活动；（二）历史研究是由现实的兴趣引起的；（三）历史是按现时兴趣来思考与理解的（参见刘昶《人心中的历史》144页）。这三层意思都强调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正是这种统一使过去的历史获得了当代史的含义。

有怎样的时代、怎样的实践就有怎样的历史思维方式。时下盛行的系统研究方式不过是这个“大串联”的世界在历史认识上的反映；计量分析法也来源于这个高度现代化生产所需要的精确的、定量的思维；神学统治下的中世纪，使得历史学家们“不想对历史的具体事实进行精确的和科学的研究；他们想要做的事乃是对神的属性进行精确的和科学的研究”（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63页）。大统一的中国西汉王朝和统一了中国北部的北宋王朝则产生了中国历史荒原上两块巍峨的丰碑——不朽的通史巨著《史记》和《资治通鉴》。

另外，现实政策的强大约束力和压力也会左右史家的认识和方法。例如苏联从三十年代起，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对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科学产生了强烈影响，阻碍了理论思维的发展，束缚了史家的创造能力（参见于沛《苏联史学中的历史认识问题》，《史学理论》1988年第一期）。再如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影射史学”的出现，也是现时政策影响的结果。

超脱现实的“纯粹的”史家几乎不存在，即使有那也是对现